

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

赵 逵 夫

一、从《鹏鸟赋》看《惜誓》的作者

《楚辞·惜誓》的作者，至汉代已不清楚。《楚辞章句·惜誓序》云：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第一句“《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首先说不知谁所作，其态度很明确。下面说：“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提出曾经有过的一种说法，但表示了对它的怀疑。

洪兴祖作《楚辞补注》只是就序中提到的贾谊，摘引了《汉书》有关贾谊生平的文字，并摘录贾谊《吊屈原赋》中几段，说：“与此语颇同”，却并未肯定地表示一个态度。但是到了朱熹的《楚辞集注》则云：“《惜誓》者，汉梁太傅贾谊之所作也。”并且说：“《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鹏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原赋》词旨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瓌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

朱熹这段话首先是对旧序作了曲解。旧序言“不知谁所作也”，并非只因为《汉书·贾谊传》中未录此篇，朱熹则将原因只

归结到这一点上来。其次，将洪兴祖的暧昧态度，说为“意为谊作无疑。”最后朱熹谈了他自己的判断依据。朱熹所谈理由，实际上也不能成为理由。屈原之后，楚国宋玉、唐勒、景差之流及汉初陆贾等并善于文辞，贾谊之前，不是再无辞赋作家。而且就《惜誓》的构思与文采而言，也并非十分优异（今人选《楚辞》者多不选此篇，便是明证）。所谓“非谊莫能及”的说法，未免绝对。

为什么古代会有“贾谊作”的说法呢？洪兴祖说对了：就因为其中有些句子其语意与贾谊的《吊屈原赋》相近。如《惜誓》云：

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系兮，
又何以异夫犬羊？

《吊屈原赋》云：

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系而羈兮，岂
云异夫犬羊？

《惜誓》云：

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交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
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

《吊屈原赋》云：

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兮，遥
增击而去之。

但同一个作者的作品而语句如此雷同甚至完全重复，是叫人难以理解的。贾谊年十八即“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恐不至辞竭才尽如此，作两篇赋也是后一篇抄前一篇。所以，我认为这两篇赋不是同一人所作。

那么，这两篇作品，到底是《吊屈原赋》受《惜誓》的影响，还是《惜誓》受《吊屈原赋》的影响？我以为只能是前一种可能。因为从《鹏鸟赋》来看，贾谊作赋好摄取、套用他人文字。《文选》李善注已指出《鹏鸟赋》用《鹖冠子》一书文句的情况，今将两赋雷同文句列表如下，以便比较：

《鵩冠子》	《鵬鸟赋》
斡流迁徙，固无休息。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
变化无穷，何可胜言。	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
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忧喜聚门，吉凶同域。	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	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
祸与福，如纠缠也。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
终则有始，孰知其极。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天不可预谋，道不可预虑。	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
水激则悍，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	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
迟速止息，必中参伍。	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同合消散，孰识其时。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
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抟。	忽然为人兮，安可控抟。
小智立趣，好恶自惧。	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
达人大观，乃见其符。	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夸者死权，自贵矜容殉名。	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
圣人捐物。至人不遗，动与道俱。	圣人遗物兮，独与道俱。
众人惑惑，迫于嗜欲。	众人惑惑，好恶积亿。
与道翱翔。	与道翱翔。
乘流以逝。	乘流则逝兮。
纵躯委命，与时往来。	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
泛泛乎若不系之舟。	泛泛若不系之舟。
细故裂蓊，奚足以疑。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以上计 22 条。一篇 500 来字的赋，竟有 22 处用《鹞冠子》成句，或稍作变动而套用之。可以说，贾谊这篇作品即是櫟括《鹞冠子》一书中有关顺天委命齐一生死思想的文字而成，当然《鹞冠子》一书的思想不止此。但因为贾谊当时受到打击排挤被贬谪长沙，读《鹞冠子》而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故以赋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情绪之时，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套用了原文的有关语句。《史记》本传言“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贾谊读书多，记忆好，脑子灵，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他的《鹏鸟赋》是如此，则他的《吊屈原赋》有所模仿套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贾谊在长沙得读楚人著作《鹞冠子》（《汉书·艺文志》：“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鹞冠子》，证明其为先秦时著作）而作《鹏鸟赋》，则其由长安到长沙途中，经南阳（治今河南省南阳市）、南郡（治今湖北省江陵）等地，得见六国之末楚人其他著作而读之，因而在过湘水时作赋以吊屈原，其中亦化用其意，甚至套用一、二文句，也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来看，是贾谊读《惜誓》而套用了其中一些文句，写成《吊屈原赋》。《惜誓》非贾谊所作，它的作者要比贾谊早。

二、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惜誓》的作者

首先，赋的开头说：“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虽然说后代诗人（如李贺）也有年纪不大而叹老的，但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而且也是唐代以后的事。古人质实，似还没有这样突出的主观感受性。后面的“寿冉冉而日衰兮”情形同此。贾谊去世之时尚只有三十三岁。所以，此赋所透出的作者的情况与贾谊的情形不合。

其次，赋中说：“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当时大汉立国已三十来年，国家安定，人民富足，形成所谓“文景之治”的局面。虽然朝廷中有守旧势力排斥革新派的情况，诸侯国势力膨胀，也有尾大不掉的迹象，但总的说来国家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定的，还不能说是“乱世”。所以作者所处时代与贾谊所处的时代不合。

再次，《惜誓》所反映的思想与贾谊不合。贾谊思想以儒家为主，又有较突出的申韩法家因素，同时还具有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在受到打击、遭遇很不顺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庄子齐生死的思想（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吊屈原赋》中）。但是，他并没有神仙家思想。《惜誓》中表现的道家 and 神仙家思想却相当突出。如：

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螭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骖。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驰骛于杳杳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

以北极为仙人所居之处，是神仙家的编造。关于沆瀣，《远游》王逸注引《陵阳子明经》：“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秋食沦阴，沦阴者，日没以后赤黄气也。冬饮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夏食正阳。正阳者，南方日中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是为六气也。”“服沆瀣以充虚”本为道家导引养生所常言，后为道教所吸收。朱雀（朱鸟）、苍龙、白虎和玄武，西汉时代叫“四灵”（见《三辅黄图·未央宫》），本指天上四大星宿。《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参为白虎”（《索隐》引《文耀钩》：“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北宫玄武”。统称为“四星”（王充《论衡·物势》：“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雀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早期神仙家之好以天象言休咎者，常常提到它们，故后来道教又称之为“四神”。《惜誓》中驱使朱鸟、苍龙、白虎的描写，表面上看来与《离骚》

写诗人作天上三日游，驱使望舒、飞廉、鸾皇、雷师、风鸟的情形一样，实际上其内涵不同。贾谊的思想同屈原比较相近，而同楚国迁陈以后一些带有浓厚神仙家思想的作家是大异其趣的。

又如其中说：

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

余因称乎清商。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王逸注：“少原之野，仙人所居。”“言遂到群仙所居，而见赤松子与王乔也。”“众气，谓朝霞、正阳、沦阴、沆瀣之气也。”又赋中说：“吸沆瀣而充虚。”虚静思想，也是晚期道家的思想。早期道家近于刑名，而晚期道家则近于神仙。神仙家本起于燕齐，至楚国于顷襄王之时东北保于陈，其地既近于道家之发源地（郢陈东面距老子家乡苦县百余里，而东北距宋都商丘也不是很远），而且比以前大大地接近齐国。又因楚国政治江河日下，当权者醉生梦死，寄人生理想于虚幻者渐多，故神仙家思想得以流行。道家、神仙家的两种思想的结合，形成楚国末期思想的一大特色。道家而带有神仙家占验、预言特色的，在楚国末期最著名的有南公。《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义》引虞喜《志林》：“南公者，道士，识兴废之数。”《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部分著录：“《南公》三十一篇，楚人也，善言阴阳。”又《史记·日者列传》只记司马季主一人“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贾谊俱向其问卜，其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色，阴阳吉凶之本。”则本是六国之末楚人。

总之楚国在迁陈之后道家、神仙家兴起，特别是形成二者合流的趋势。在屈原时代及稍前，楚国虽已有道家，庄子及鹖冠子便是著名人物，但还只是在野、在下层流传，贵族、一般士人之中尚无多大市场。同时，当时道家并不带有浓厚的阴阳、神仙家味道，虽然道教从开始也讲清静无为，讲长生，讲神仙。《惜誓》中写的驱使四灵，餐饮六气等既非早期道家所有，也不是贾谊的思

想。故可以断定，《惜誓》不是贾谊所作，而是楚国迁陈以后楚人的作品。

三、《惜誓》为唐勒所作

《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我在《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一文中考证，银雀山汉墓出土《论义御》和《楚辞·远游》均为唐勒所作。《论义御》首简之简背有“唐革”二字，“革”为“勒”字之借。书名写在首简之简背，篇名写在篇末，是汉简的通例，故我以为“唐革”二字为该卷书之书名。参加了银雀山汉简挖掘和整理工作的吴九龙同志确定为唐勒赋残简的“论义御”一简（简上只此三字），我以为是该篇篇名。也就是说，《唐勒》这部书中所收唐勒作品，其第一篇为《论义御》。

《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楚人。”《楚辞·远游》无论思想、语言，都与唐勒的《论义御》十分相近，故我定为唐勒所作。

我以为，《惜誓》的作者也是唐勒。《惜誓》应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唐勒赋四篇”中的一篇。

首先，从《惜誓》所反映的背景和作者情况来看，乃是楚国迁陈之后楚人的作品。这同唐勒的生活与创作时代一致。关于这一点，除上一部分所说理由之外，还有其他证据。《惜誓》中说：

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

王逸注：“丹水，犹赤水也。”“大夏，外国名也，在西南。”俱误。丹水与赤水为两个水名，典籍中未有将两水相混者。赤水为神话中水名。《山海经·海内西经》：“赤水出（昆仑）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离骚》中也说到赤水。丹水为现实社会中实有之水，即今河南省西南部之丹水。楚人发祥于丹水

之阳，地名丹阳。《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即此水。《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其地靠近中原。郢陈在东而丹阳在西，在同一纬度上。楚顷襄王二十一年之后南楚纪郢一带大部分被秦军所占领，诗人就近处所能见而借景抒怀，只能写郢陈附近的山川风物。

“右大夏之遗风”的“大夏”，也不是外国地名，而是指夏县，即西汉时的阳夏。《史记·货殖列传》：“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树漆。”颜师古注：“陈，陈县也。夏，夏县也，皆属淮阳。”地在淮阳，故后来称作“阳夏”。其地南距郢陈只数十里。秦为郡，汉为县。相传为夏后太康所筑，故名“夏”、“大夏”、“夏县”，后又名“阳夏”，隋开皇七年改为太康县（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开封府”）。“右（有）大夏之遗风”，是说楚都迁于陈，其地近于夏后太康之古城，有上古遗风。

赋中将楚人发祥地的丹水和传为太康所筑夏县拉扯进去，一方面因为距此二地颇近，另一方面这也是楚迁陈之后楚朝廷中王侯公卿自我解嘲心态的反映，在当时也就成了较普遍的说法。但在诗人，还是知道离开楚人的故都，离开祖祖辈辈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实反映着楚国的式微，故赋中说：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

又说：

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这是楚人离开郢都（纪郢）迁至陈以后的作品，再明显不过。

而且，从上引这四句看，赋应作于楚考烈五十年（前253年）楚都迁于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以北）之前。楚都迁至钜阳不久又迁至寿春，前223年楚被秦灭。楚都迁于钜阳以后，楚国更为衰微，则楚朝野从上到下恐已没有再返回郢都的希望，只希望不要向东南节节败退。《惜誓》中表现出希望返回郢都的愿望，

所以，当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 年）至楚考烈五十年（前 253 年）之间。

根据以上的事实，可以断定《惜誓》是楚人迁陈之后作品，约作于顷襄王后期至考烈王初叶。

唐勒与宋玉同时，而年岁较宋玉稍大，大体生活在楚顷襄王（前 298—前 263）、考烈王（前 262—前 238）时代，其创作大约主要在楚都迁至郢陈的一段时间。因为《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司马迁这里所说唐勒等人的创作活动，其上限在“屈原既死之后”，其下限在“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之前。关于屈原卒年，过去学术界多从郭沫若之说，以为在前 278 年，姜亮夫先生主前 285 至前 283 年之间，我考定在前 283 年（顷襄王十六年）。则唐勒的创作活动，大体上在顷襄王中期以后。关于下限，应在秦灭楚（楚王负刍五年，即前 223 年）数十年之前，也即楚“日以削”之前。那么，定在楚迁都钜阳（前 253 年）之前，是比较合适的。这里说“上限”、“下限”，是为了述说的方便。其实，这个时间界线并不是截然的，而只是一个“模糊数学”。但这已足以说明，唐勒的生活与创作年代与《惜誓》所反映作者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惜誓》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和作品的风格，也同《远游》相一致。请看：

《远游》中提到仙人赤松、韩众、王乔。

《惜誓》中提到赤松、王乔。

《远游》中说：“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

《惜誓》中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远游》中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

《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澹然而

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远游》中说：“至南巢而壹息。”

《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

这不像《鹏鸟赋》对《鹖冠子》，《吊屈原赋》对《惜誓》的套用文句，甚至照搬。可以说，这两篇中没有一句话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们首先表现出思想上的共同特征。楚国在怀王后期虽然开始走向衰败，但仍然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保有江汉流域大片土地，所以尽管道家思想对不少人有较大影响，但主要还是近于刑名的部分起作用，就整个统治集团来说，仍然以儒家、刑名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到顷襄王迁陈之后，就像一棵百年大树连根拔出后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人们普遍感到生死未卜，前途暗淡。因之，道家思想中顺天委命、虚静无为的思想和追求长生久视的意识较普遍地流行起来，本来主要在民间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失意者、没落贵族中间流行的神仙家思想，也与之结合，形成当时一部分文人和贵族的主导思想。唐勒同宋玉一样，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因而寄理想于虚无，作为逃避现实、摆脱苦恼的途径。但他并非完全忘却了现实，成了“方外”之人，他仍然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危亡，也时时惦记着故都，希望楚国能恢复昔日的安定与强盛。“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这两句就生动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的思想。所以说，从《惜誓》所反映的思想来说，也与《论义御》、《远游》相一致。

再次，《惜誓》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也与《远游》和《论义御》相似。如《惜誓》中“飞朱鸟使先驱兮”以下两节，同《远游》中“风伯为余先驱兮”以下两节及“雌霓便娟以增挠兮”一节，都是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以表现诗人超脱尘俗、高举远扬的思想情绪。而这一特色在《论义御》中也得到体现。如：“骋若飞龙，逸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蒙汜。”“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起，进退屈伸，

莫见其尘埃。”“过归雁于碣石（按指在碣石山上空超过归雁），铁鹞鸡于姑余。骋若飞，骛若绝。”也是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二者不但在思想上相通，在艺术手法风格上也表现出一致性。

由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肯定《惜誓》同《远游》、《论义御》的作者为同一人，即唐勒。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人海诗区》书名正解

清代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标点，陈高华校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是吟咏北京诗篇的选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书名的含义，该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解释道：

编者取书名为《人海诗区》。“人海”，极言人众也。五百位作者不谓不众，两千首诗亦不可谓不多，搜寻当非易事。……“区”同“讴”，讴歌也。“区”同“讴”，但此处“讴”当作歌曲之意，释为动词似不妥。说“人海”是“极言人众”即作者众多云云，则大误矣。此处“人海”乃代指京城北京。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云：“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清初查慎行《人海记》自序云：

通记三十年来，客居京师，岁月过半。其间耳目闻见，随手辄录，零丁体系，不下数百条。雪窗检点，裒集成卷，命曰《人海记》。即用苏轼诗句之意，以“人海”代指京师。至乾隆间佚名辑录咏唱北京的诗歌，以《人海诗区》作为书名，不过是沿用之而已。

明清两代有关京城（北京）的地方文献，其书名大都点出是记载北京的。或直指，如明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或代指，如明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考》等；《人海诗区》亦代指之一例也。